



凤凰文库·历史研究系列

大国通史丛书

总主编 钱乘旦

英国通史

主编 钱乘旦

第二卷 封建时代

——从诺曼征服到玫瑰战争

孟广林 黄春高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凤凰文库·历史研究系列

大国通史丛书

总主编 钱乘旦

英国通史

主编 钱乘旦

第二卷 封建时代

——从诺曼征服到玫瑰战争

孟广林 黄春高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通史. 第二卷/钱乘旦主编.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 9

(凤凰文库. 历史研究系列)

ISBN 978-7-214-15032-5

I. ①英… II. ①钱… III. ①英国—历史 IV. ①K56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35405 号

书 主	名 编	英国通史·第二卷 封建时代——从诺曼征服到玫瑰战争 钱乘旦
著 者	策 划	孟广林 黄春高 王保顶
责 任 编 辑	装 帧 设 计	徐海 姜嵩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出 版 社 网 址		http://www.jspph.com
经 销	排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照 排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本	652 mm×960 mm 1/16
开 本	张	27.5 插页 4
印 张	数	366 千字
字 数	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版 次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15032-5
标 准 书 号	定 价	60.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最新成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历史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当代思想前沿、教育理论、艺术理论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和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总序

钱乘旦

写一部多卷本英国通史一直是我们的夙愿，这个夙愿已经持续好几代人了。

英国史对中国人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在19世纪，第一个打开中国国门的是英国，从那个时候起，人们就强烈地想要了解英国，看这个小国是如何成为世界大国的。1839年林则徐组织编写《四洲志》，其中关于英国历史的记载有一两千字，这就是中国人对英国历史最早的系统记叙，算是一篇“简明史”。1841年，魏源将《四洲志》的内容综合于《海国图志》中，中国人关于英国历史的了解，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以后，到20世纪初，陆陆续续出版了一批翻译书籍，向国人介绍西方各国的历史文化，其中影响较大的包括《泰西新史揽要》^①、《万国通史》^②、《万国史略》^③等等，这些著作中英国的内容占很大篇幅，比如《万国通史》30卷中，涉及英国史和英帝国史的有6卷，反映了在那个时候人

① 马恩西：《泰西新史揽要》，李提摩太、蔡尔康译（Robert McKenzie, *History of Nineteenth Century*, Chinese edition translated by Timothy Richard and Cai Erkang），上海书店，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

② 《万国通史》（J. Lambert Rees, *History of Ancient and Modern Nations*），李思伦白辑译，上海广学会，光绪二十六至三十一年（1900—1905年）。

③ 彼德巴利：《万国史略》，金陵江楚编译局，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

们对英国的注意特别强烈。1881年,有一本叫《大英国志》^①的翻译书在上海出版,其中内容全都相关于英国史,这就是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用中文出版的“英国通史”。译者是一位英国传教士,虽说他向中国人介绍英国的历史完全是出于宗教的目的,但客观上,他是第一个向中国读者全面介绍自古代直至维多利亚女王时期英国历史脉络的有心人。

1907年出版了另一本译著《英民史记》^②,该书英文作者叫葛耘(J. R. Green,今译格林),是一位非常重要的英国历史学家,他改变了当时史学界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史的一贯传统,而以普通人民作为历史叙述的主要对象。《英民史记》在今天可以翻译成《英国人民史》,那是他重要的作品之一,这部作品在那个时代被译成中文,的确有一点超时代的意味。

几乎与此同时,1903年,作新社推出《英国维新史》^③,此书以英国革命为题材,记叙了查理一世从继位到内战结束被斩首的历史,是一部宣传革命改造国家的作品。1906年,《北洋学报》则连续14期刊登《英国变政小史》^④,其内容涉及英国的议会、宪法、国王、内阁、地方自治等各个方面,宣传用变革的方式改造国家。尽管这两部作品都不属于通史范畴,却都是中国人撰写的有关“英国史”的最早文字,多多少少算是“断代史”。

民国时期继续出版翻译著作,其中钱端升的《英国史》^⑤最为突出。这部书的作者是屈勒味林(亦译为屈维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他是20世上半叶英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也是19世纪

① 《大英国志》(Thomas Milner, *Chronicle of Great Britain*, published by the Mission Press of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856), 慕维廉编译,上海益智书会,光绪七年(1881年)。

② 葛耘:《英民史记》(John Richard Green, *Th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People*, Chinese edition translated by M. E. Macklin & Li Yushu), 马林译,上海美华书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

③ 《英国维新史》,作新社藏,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

④ 《英国变政小史》,《北洋学报》1906年连载。

⑤ 屈勒味林:《英国史》(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History of England*), 钱端升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再版。

著名的历史学家、辉格史学的创始人马考莱的外甥。这部书本身的价值很高,但译文却半文不白,读起来很费力。钱端升本人是著名学者,他翻译的这部《英国史》,曾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指定为高等学校的历史教科书。

新中国成立后,又有几本英国通史著作被翻译成中文。1958年英国历史学家莫尔顿撰写的《人民的英国史》^①在北京出版,莫尔顿是英共党员,其论点受苏联体系影响很大,但书中仍保留着英国历史学家的一些特点,有自己的编写结构。这部书从远古一直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部地地道道的“通史”;但它作为通史又太简单了,所以只能算是英国简史。此外,有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也太陈旧了,不再被历史学家们所认同。

苏联学者塔塔里诺娃的《英国史纲(1640—1815)》^②于1962年出版,它的内容仅限于1640—1815年,其实是一部英国近代史。这部书的引进,是当时全盘学习苏联的必然之物,书中典型地体现了那个时代苏联主流学界对英国近代历史的基本观点,其中对一些重大事件及人物的评价(如17世纪英国革命、工业革命、工会运动等),后来都成为我国世界史教科书中的标准说法。即使在今天,这本书对中国的英国史学者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它让我们了解苏联体系对英国历史的处理方式,终究,苏联体系是一个自成一体的重要历史学体系。

“文革”结束后,翻译作品在各个领域中如泉喷出现,而最早出现的英国通史著作,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英语国家史略》。^③丘吉尔是政治名人,但也写过许多历史著作,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等,当然,这些著作大多是由他口述而由别人代笔

① 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A. L. Morton, *A People's History of England*),谢连造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

② 塔塔里诺娃:《英国史纲(1640—1815)》(К. Н. Татарина: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англии 1640—1815 гг. Рус*),何清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

③ 温斯顿·丘吉尔:《英语国家史略》(Winston Churchill,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薛力敏、林林译,新华出版社,1985年。

的。《英语国家史略》分上下两卷，第一卷写英国本土及殖民扩张史，第二卷写英帝国白人殖民地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的历史。丘吉尔是一位保守派政治家，他的历史观也充满保守主义色彩，他的这部书是新中国成立后翻译并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以保守主义立场撰写的英国通史，让读者有机会了解保守学派对英国历史的阐释。

另一部保守主义作品是《英国现代史》^①，作者梅德利科特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主编的《朗曼英国通史》(*Longman History of England*)共11卷，我们翻译的是其中最后一卷，内容涉及1914—1964年的英国史。由于是多卷本英国通史中的一卷，所以这本书只是一部断代史，而且是一部不完整的20世纪断代史。

有一部真正的“英国通史”被译成中文，即肯尼思·O. 摩根主编的《牛津英国通史》^②。摩根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历史学家，他这本书从公元前55年一直写到1983年，内容涉及英国历史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传统的政治、外交、战争、司法等内容，而且把衣食住行、人口家庭、心态娱乐等这些新鲜的领域也写进去，体现着战后西方的史学观念。但是作为单卷本的英国通史，在有限的篇幅内写这么多内容其实是不可能的，结果，在一般书中要用好几页纸才能说清楚的事，在这本书中往往只剩下一两个小节。对不了解英国历史的普通读者来说，这本书起不到蒙学的作用；而对于专业的英国史学者来说，这本书又太浅了，学术含量不够。

阿萨·勃里格斯的《英国社会史》^③也是一本通史性质的书，按照当代西方史学观念，这样的社会史其实是“去政治”的英国史，它的重点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对传统的政治、军事、外交等内容很少提及。专

① W. N. 梅德利科特：《英国现代史》(W. N. Medlicott, *Contemporary England*)，张毓文等译，黄席群校，商务印书馆，1990年。

② 肯尼思·O. 摩根主编：《牛津英国通史》(Kenneth O. Morgan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Britain*)，王觉非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

③ 阿萨·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Asa Briggs, *A 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陈叔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

门的“社会”通史其实也很重要，它让人们了解那些在政治家眼里不起眼的事，也就是老百姓的琐碎事。《英国社会史》从史前一直写到20世纪80年代，涉及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其内容之丰富、涵盖面之广，很少有单卷本通史书能够超越它。

2013年出版的《英国史》(上、下册)^①是一部适合普通中国人阅读的书。这部书从古代一直写到20世纪下半叶，它采用传统的历史学叙事方法，以时间为序，铺陈了英国历史的完整过程。它试图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种内容都包含进去，对初学以及想一般了解英国历史的人来说，是一本不错的书。只是它叙述平平，虽说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却缺乏思想和思考，可说是一部“专业”书。

在翻译著作接踵而来的同时，中国学者自己编写英国通史的工作也终于起步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术繁荣，英国史研究也获得跳跃式发展。按道理说，中国人接触到的第一个外国国家的历史是英国的历史，写英国史包括英国通史应该很早就开始，可是由于各种原因——学术的、资源的、历史条件的、学科传统的等等，到林则徐组织《四洲志》的140年以后，中国学者才终于下决心开始这项工作。1981年，程西筠、王璋辉合写的《英国简史》^②率先出版，虽说该书确实是“简史”，拿今天的眼光看可以有更大的期许，但它终究迈出了第一步，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英国通史。接着又有一些通史出版，其中陶松云、郭太风合著的《英国史话》^③是一本供青少年阅读的普及性读物，在当时也是一个尝试。王荣堂的《英国近代史纲》^④是一部断代史，它涉及1640—1914年的英国史，虽说它只是断代史，却也是一部完整的断代史。王觉非主编的《近代英国史》^⑤更进了一步，从学术含量方面说，这本书达

① 克莱顿·罗伯茨、戴维·罗伯茨、道格拉斯·R.比松：《英国史》(Clayton Roberts, David Roberts, D. R. Bisson, *A History of England*)，潘兴民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

② 程西筠、王璋辉：《英国简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

③ 陶松云、郭太风：《英国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

④ 王荣堂：《英国近代史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

⑤ 王觉非主编：《近代英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到一个新的水平。

1988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由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有分量的英国通史终于问世,标志着中国的英国史研究迈上一个新台阶。由蒋孟引主编,辜燮高、王觉非、张云鹤、孔令平四位学者参加写作的《英国史》^①计62万字,从英国远古一直写到20世纪。书中吸收了许多研究新成果,从多个角度再现了英国的历史进程。这本书的出版,改变了中国没有自己的英国通史的局面,为国内大学提供了一部完整的英国史教材。这本书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表达了中国学者自己的观点,一个国家的学术研究,拿不出自己的观点是不行的,否则它也就成为变相的翻译了。

21世纪初有三部英国通史接踵出版,它们是钱乘旦、许洁明的《英国通史》^②,阎照祥的《英国史》^③,高岱的《英国通史纲要》^④。这三部书都出自新一代学者之手,其观点和知识体系都更加新颖、更能反映国际学术界的新发展。它们作为英国史入门书是绰绰有余的,不仅为英国史课堂教学提供了良好的教材,也为一般想了解一点英国历史的普通读者提供了读本。但是,作为对英国历史更精细的阐述,以及中国学者更深入的研究,它们却远远不够;要反映中国学者对英国历史理解的水平、研究的能力,需要写一部多卷本英国通史,这就是我们长期以来抱持的夙愿。

我们这部英国通史从2008年开始筹划,历经七年终于写成,现在就要出版了。参加写作的,多数属于更年轻一代的英国史学者,其中许多是我的学生。作者们都经受过相当严格的英国历史专业训练,熟悉国际学术界状况,了解研究动态;他们都有国外学习的经历,具备良好的语言能力,能够接触史料、著述,因此有优厚的学术条件。所有这些和他们的

① 蒋孟引主编:《英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② 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

③ 阎照祥:《英国史》,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④ 高岱:《英国通史纲要》,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年。

先辈比较起来都是得天独厚的——写一部多卷本的英国通史，在20年前几乎是天方夜谭！不过，学术总是一浪推一浪的，没有先辈的努力和积淀，也就没有今天这部多卷本的英国通史。

英国这个国家值得人们的特别关注，因为它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特殊的作用。我在《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的卷首语中曾经这样说：

在世界各民族中，英国算得上是一个典型，它体现着一种独特的发展方式——英国发展方式。这种方式以和缓、平稳、渐进为主要特色，即使对世界事务不甚了解的人也会有一种模糊的印象，即英国是一个稳重的民族，它注重实际而不耽于空想，长于宽容而不爱走极端，在世界历史的长剧中，属于英国的惊心动魄的场面着实不多见。

但正是这个不爱走极端的稳重的民族为现代世界（至少是西方世界）奠定了好几块基石：英国最早实现工业化，成为近代大工业的开路先锋，从而把全世界推进到工业时代。英国最早实行政治变革，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树立了榜样。英国的发展方式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模式，证明在一定条件下渐进道路的可行。英国的科学精神和经典理论丰富了人类的精神宝库，其求实与理性的态度明显地奠定了科学思维的基础。英国对现代世界的贡献与其稳重的行为方式一样令世人印象深刻，可以说，英国率先敲开了通向现代世界的大门，英国是现代世界的开拓者。^①

正因为如此，英国的历史就值得特别注意，人们需要走进英国历史自身之中，来品味它的特征。尽管时至今日，英国的辉煌已经不再，它重新回到静谧的英伦三岛，但英国的历史还是值得回味的，我们写这部英国通史，便旨在和读者们一同去回味这个历史，并沉思它

^① 钱乘旦、陈晓律：《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卷首语第1页。

的蕴意。

江苏人民出版社给了我们坚定、热情、长期的支持，王保顶先生为书的写作和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每一卷编辑也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为此，我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并希望能从读者那里得到回报。

2015年7月8日，于北京

前 言

从 1066 年诺曼征服到 1485 年“红白玫瑰战争”结束的四百余年间，英王国的疆域处于变动不居状态，最终固定在英格兰。这一变动主要是英、法两国之间的封建关系以及英国王室与大陆封建诸侯乃至王室之间的联姻所致。1066 年，作为法国君主之难以羁服之封臣、其父辈曾经与英王有姻亲关系的诺曼底公爵——征服者威廉跨海征服英格兰，即位为威廉一世，并将英格兰和大陆诺曼底公爵领整合为一体，实行跨海而治，与法国王权相抗衡。1154 年，作为法国君主另一强大封臣的安茹伯爵之子亨利，在英国内战结束后以其英王亨利一世外孙之资格继承英国王位，是为亨利二世。在此之前，安茹伯爵已经兼并了大陆诸多诸侯的领地，因而亨利二世即位后空前扩大的英王国跨海而治的统治范围，被称之为“安茹帝国”。此后，英、法两国间的领土之争更趋激烈，至 1337 “百年战争”爆发达到高潮。这场持续至 1453 年的战争，最终使英国放弃大陆之领地，将其王国疆域最终划定下来，同时也最终去掉了作为法王封臣的旧有名分。另一方面，在这四百余年间，英国时断时续地与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地区进行军事征服，并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实施过政治统治权，但最终仍未能将它们吞并进王国疆域之内。

在这一时期，英王国的封建政治体制，经历了一个从封建王权到封

建议会君主制建构、演进的历史过程。借助于强有力的军事征服,威廉一世将大陆诺曼封建制度与英国本土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公共政治遗产作一有机调适与整合,融封建宗主权与国家君主权为一体,确立了封建君主的政治权威。在此后百余年中,英王借助于基督教“王权神授”的理念与公权力,不断削弱封建贵族的特权而进行政治集权,渐次建构起中央官僚政府机构和地方分郡制,凸显其一国之君的公共政治权威。然而,由于日耳曼原始军事民主制因素的残存和封建习惯的限制,由于国家公共政治体制基础的薄弱,英王与贵族的权力争夺时隐时现。1215年约翰王在与贵族的冲突中失利,被迫签订了旨在恢复封建习惯、限制王权的《大宪章》。此后,国王与贵族冲突不断,并在冲突之中形成政治力量的“平衡”与“均势”,进而将中小贵族与城市市民的势力纳入其中,最终自1295年开始形成“议会君主制”,由君主与教、俗贵族及地方等级代表组成议会协商为政。议会的地位与作用在14世纪逐渐凸显,不仅形成上议院和下议院,而且下议院逐渐产生“议长”,逐渐拥有税收批准权和立法权。这一时期的议会虽对王权形成某种限制,但它从根本上说是从属于王权、支持王权的,而国王的意志对议会有着很大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封建制度的确立和发展,使教、俗贵族成为这一时期英国王权的政治基础。教会贵族虽然因宗教信仰与神权组织的特性而与罗马教廷建立并保持联系,并一度伸张教权自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本国王权仍予以大力支持,并积极参与王国政务。世俗贵族构成了王国中的主要政治势力。他们既支持王权,在王国的政治、军事、司法等要务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同时他们又试图限制王权,反对君主集权危害自己的封建特权,因而时常与王权发生冲突。到了14、15世纪,随着“变态封建主义”的兴起,大贵族通过以货币支付为纽带的庇护制而大大拓展实力,由此而对王国政治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不仅促成了1327年的王位交替与1399年的王朝鼎革,而且在15世纪中后期酝酿起争夺王位的玫瑰战争。

封建时代城乡经济的发展对英王国的历史发展深有影响。诺曼征

服后的一段时期,各级教、俗领主奴役维兰(农奴)以及自由农民的封建庄园经济一度盛行。自12、13世纪开始,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品经济逐渐勃发。在此基础上,一方面,随着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乃至“赎买”人身自由的渐次交替,农奴逐渐获得解放,但之后又面临着国家的重税和商人高利贷的盘剥,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不可避免。此外,在这一过程中,不少中小贵族通过缴纳免役金(盾牌钱)远离军事,专事经济活动并使用雇工,形成乡绅阶层,而少数自由农民因经营有方而跻身富有的约曼阶层,成为乡绅阶层的重要补充来源。每郡选出的参与议会的“骑士”,就是这个阶层的代表。另一方面,城市化也随之展开,城市数量和规模日益扩大。在向王权以及领主争取特权的运动中,相继出现了自由城市,城市市民获得了人身、土地占有、司法、贸易等各种自由特权;有的进而形成自治城市,即获得自主选举市议会和城市长官而实现自主行政管理的自治特权。在议会兴起后,很多城市作为“议会城市”又获得选举代表参与议会的权利。市民和乡绅阶层选出作为地方等级的代表参与议会下议院,推动了议会君主制的建构与发展。

这一时期,英王国的思想文化经历了一个不断积淀、流变的过程,而世俗教育摆脱神学枷锁的兴起,尤其是牛津、剑桥等高等学府的形成与发展,更为思想文化嬗变提供了深厚的知识温床。基督教的“王权神授”主张在诺曼征服后广泛传播,到索尔兹伯里的约翰那里又得到充分的理论阐发,由此而推动了王权的神化与强化。但另一方面,源远流长的“王在法下”的传统虽然难免有些许“神法”光环,但其主要从残存的原始民主观念的习惯出发,聚焦在君权运作的边界与规范上。这一传统有时以限制王权为主旨,有时则以挺立王权为内蕴,它的扩展,在消解“神本”政治观念与规范君权运作上很有意义。几经演绎,它最终酝酿出成福特斯鸠的“有限君权”学说。这一时期,异端思想也萌发传播。罗吉尔·培根等人的“唯名论”对经院哲学的正统观予以反叛。到了14世纪,异端思想逐渐转向对现实政治的不同角度的批判。约翰·保尔借助于阐发原始基督教的平等观念来发动农民反抗封建压迫。威克里夫创造性地抒

发市民异端的“神恩”论思想，否定了罗马教会神权的权威，勾画出建构民族教会的未来蓝图，影响深远。

民族语言的形成和与之相应的民族文学创造的勃发，构成了这一时期英王国在文化领域中的另一道亮丽的历史风景线。诺曼征服后，诺曼底的法语为诺曼贵族所用，拉丁语则为教会、征服与学术所通用，本地英国人特别是底层社会仍说本地英语。随着历史的变迁，英语逐渐吸收了法语的诸多词汇，越来越成为各阶层人们共同的口语，并为官方公告、文书所采用，用英语创作文学作品和学校授课陆续出现。与之相应，文学创作逐渐从书写宗教说教转向世俗生活，进而从描绘骑士传奇转向丰富的社会现实，产生了有关亚瑟王、罗宾汉传说的小说、戏剧与《坎特伯雷故事集》、《农夫皮尔斯》那样的优秀作品。作为民族语言的英语，也在文学创作过程中日臻成熟。

如果说诺曼征服后的英王国还是一个疆域不确定、统治方式粗陋、庄园经济盛行、文化“空白”而又语言运用混杂的封建政治共同体，那么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到了15世纪末，它已经发展成拥有固定的疆域、共同的民族语言、议会君主制日臻成型、商品经济勃兴、思想文化颇有建树的封建国家。这些都为英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崛起打下了深厚的传统基础，为其近代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建构提供了充足的历史源泉。

本卷主持人 孟广林